



大会

第六十三届会议

正式记录

Distr.: General
26 December 2008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六委员会

第 19 次会议简要记录

2008 年 10 月 29 日星期三下午 3 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罗德里格斯·皮内达女士(副主席) (危地马拉)

目录

议程项目 73：追究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的刑事责任(续)

议程项目 75：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工作报告(续)

本记录可以更正。更正请在有关记录的印本上作出，由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在印发之日
后一星期内送交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DC2-750, 2 United Nations Plaza）。

更正将按委员会分别汇编成册，在届会结束后印发。

08-57463 (C)



巴亚提先生(伊拉克)缺席,副主席罗德里格斯·皮内达女士(危地马拉)主持会议。

下午 3 时 5 分宣布开会。

议程项目 73: 追究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的刑事责任 (续) (A/C.6/63/L.10)

1. **Telalian 女士**(希腊)代表主席团介绍关于追究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刑事责任的决议草案 A/C.6/63/L.10,称该决议草案已经过非正式协商并由追究刑事责任问题工作组进行了审议。该决议草案进一步发展了大会第 62/63 号决议,增列了意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内容。该决议草案提出了这方面的一些一般性原则,但不试图创设可能对本组织活动造成影响的其他积极义务。

2. 序言部分第 4 段是新的,其中承认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在争取实现《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方面的宝贵贡献。序言部分第 9 和 10 段也是新的,这两段重申有必要维护联合国的形象、公信力和廉正,强调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所犯罪行对完成本组织的任务所造成的危害。序言部分第 11 段提及大会关于联合国关于援助和支持受联合国工作人员和有关人员性剥削和性虐待受害人的全面战略的第 62/214 号决议。在序言部分增加了新的第 12 段,以强调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以确保追究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的刑事责任。最后,序言部分倒数第 2 段回顾了第 62/63 号决议,最后一段提到正义问题。

3. 在决议草案执行部分,新的第 5 段鼓励各国在刑事调查或刑事程序或引渡程序方面,相互给予援助;探索各种方法和手段,便利利用从联合国获得的信息和材料;为严重罪行的受害人、证人以及提供相关信息的其他人提供有效保护;探索各种方法和手段,充分响应东道国与能力建设有关的请求。第 8 段指出,将在大会第六十四届会议期间,在第六委员会一个工作组的框架内继续审议法律专家组的报告,特别是其法律方面的问题。

4. 新的第 10 段请联合国考虑采取任何适当措施,便利为有关国家提起的刑事诉讼的目的利用有关信息和材料,同时牢记适当法律程序的各种考虑。第 11 段也是新增的,涉及在联合国行政调查确定,针对联合国官员和专家的指控没有根据时,为恢复这些官员和特派专家的信誉和声望采取适当措施。第 12 段涉及提供信息和材料,而第 13 段强调有必要避免对报告有关指控的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的报复。

5. 在第 14 段中,大会赞赏地注意到各国政府响应第 62/63 号决议而提供的资料,在第 15 和 16 段中,大会请秘书长向第六十四届会议报告该决议草案的执行情况,并指出了该报告应列入的信息。最后在第 17 段中,大会决定在其第六十四届会议临时议程中列入题为“追究联合国官员和特派专家的刑事责任”的项目。

6. 她感谢各国代表团在决议草案谈判中的建设性参与和妥协精神,希望该决议草案可以不经表决获得通过。

议程项目 75: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工作报告 (续) (A/63/10)

7. **Ioannou 女士**(塞浦路斯)就“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这一专题发言说,塞浦路斯代表团支持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一读通过的条款草案的主旨和逻辑,条款草案反映了武装冲突期间条约的连续性原则以及不论敌对行动如何均要维护法律秩序和稳定性的必要性。在这方面,她赞成第 9 条草案的主旨,即维持一国在条约以外履行国际法规定义务的义务,并赞成在第 2 条中同时列入国际和非国际冲突。考虑到传统的国家间冲突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其他类型的冲突所取代,编纂工作必须尽可能全面和立意深远。

8. 此外,她支持第 13 条关于在一项条约与一国的自卫权不符的情况下中止该条约的规定,她认为,该条的适用范围也应当延伸到有关国家打算终止或退出该项条约的情形。另一个造成可能终止、退出或中止一项条约的因素是交战一方实质性违背条约。

9. 塞浦路斯代表团同意第 15 条的规定，即侵略国不得在武装冲突使其受益的情况下，以武装冲突为由终止、退出或中止一项条约的运作。考虑到不受武装冲突影响的条约类别清单是非穷尽式的，她支持这一清单。不过条款草案有两个领域需要加以澄清：第一是武装冲突对交战国之间的条约关系的影响，这与对交战国和非交战国之间的条约关系的影响不同；第二是被中止条约的恢复施行机制。与第三国可能中断条约关系的问题也值得更仔细的考虑。

10. **Belliard 女士** (法国) 说，国际法委员会应当继续着重习惯国际法的实质性问题以及该法的编纂，而不是编纂时机尚不成熟的一些问题的相对规范性或纯理论研究。她欢迎作为纪念委员会六十周年的一部分所进行的富有成果的讨论，希望今后继续开展这类交流。

11. 她还欢迎委员会二读通过关于跨界含水层法的条款草案，并赞成委员会所建议的两步走后续工作办法。鉴于这一专题的高度技术性以及依据的科学问题，会员国应当对该条款草案深入审查，以便大会今后能够评定拟议一项一般性公约是否妥当。她赞扬委员会一读通过的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的条款草案，法国代表团将就该条款草案提出详细的书面意见。

12. 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问题，编纂工作是有用的，因为存在大量习惯法，需要法律上的可靠性。法国代表团赞成特别报告员在其初步报告 (A/CN.4/601) 中所述的对这一专题范围的观点。所有国家官员均应包含在内，尽管大多数高级国家官员应当单独处理。委员会的工作如果仅限于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外交部长，则其相关意义要小得多。还有，外交人员、领事官员、特派团成员和各国驻国际组织代表不在此专题范围之内。国家官员的家属问题也不应当考虑，因为根据习惯国际法，家属不享有豁免。

13. 该专题应当仅限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有关官员在其国籍国的管辖豁免问题纯粹是该国的本国问题。在国际刑事法庭的豁免也应当排除在该

专题之外，因为这些法庭都有自己的豁免规则。最后，委员会不仅应当审查在职官员所享有的豁免问题，还应当审查前官员所享有的豁免问题。

14. 近期在普遍管辖权或准普遍管辖权方面的发展是国家官员豁免问题具有相关性的一个原因。不过，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就在国外所犯罪行而言，一国可被确认为因其他理由，特别是受害人的国籍而享有刑事管辖权。不过，重要的是在普遍管辖权和豁免之间不当有任何含混不清之处。正如国际法院在逮捕证一案中所指出的，必须将国家法院的管辖权规则与管辖豁免规则仔细区分开来。管辖权并不意味着没有豁免，而没有豁免也不意味着管辖权。在审查习惯国际法中豁免的可能例外时，委员会应当铭记这一区别。

15. 属人管辖豁免和属事管辖豁免之间的区别是关键，这种区别不仅在于主要是功能性的豁免依据，而且在于一官员可能根据其在该国的级别提出的豁免范围。这种区别必须加以坚持并细化。委员会应当特别是根据国际法院的判决，研究确定哪些官员可以获得属人管辖豁免的标准。

16. 最后，法国代表团对委员会审查预审阶段豁免的影响表示兴趣，并认为，国家官员的不可侵犯问题应当纳入该研究的范围，因为不可侵犯概念与豁免概念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17. 关于驱逐外国人的问题，2008 年所审议的两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使委员会偏离了这一问题的根本所在。在第一个问题，即驱逐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者的问题上，这类人员不应当与其他国民区别对待。因此，不驱逐本国国民的原则必须适用于具有一个或以上其他国籍的人员。在此问题上不必要单列一条款草案，因为这一问题可以在第 4 条草案的评注中加以说明。关于第二个问题，即丧失国籍和与驱逐有关的开除国籍的问题，她同意特别报告员的观点，即没有理由拟定一具体条款草案。在评注中提及国籍规则即可，同时考虑到丧失国籍或开除国籍的问题是今后可能驱逐该人无关的另一个问题。

18. 在对条约的保留专题上，委员会通过了大量准则草案，这无疑将有助于使《实践指南》成为一份穷尽式文件。关于委员会正在征求各国政府意见的一些具体问题，应当在解释性声明的法律效力和保留的法律效力之间加以区分，并在审议对声明和保留的反应及各自效力的问题时铭记这一区别。保留、接受和反对制度受条约法规则约束，委员会目前的工作说明了这些规则的法律技术问题。但是解释性声明和对声明的反应与此不完全相同，有时它们的影响范围比相关的单个条约更大，并触及各国如何解释其根据国际法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问题。法国代表团因此支持特别报告员出于本草案的目的对研究一般默理论采取谨慎的态度。同样，深入研究的对一项解释性声明的认可与缔约方商定对条约的解释之间的相似性，将大大超出对条约的保留的案文草案所必需的范围。

19. 但是，还是应当在批准、不批准、沉默和重新定性等不同类型的反应之间加以区分，尽管各类反应的效果带来不同的问题。在一些情况下，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可被解释为默认。不过正如准则草案 2.9.8 和 2.9.9 所述，对一项解释性声明的接受既不能推定，又不能仅从沉默中推理。在一些特定情况下，例如在两个缔约国之间发生争议的情况下，如果一缔约国对另一缔约国提交的解释性声明的细节或澄清直接表示重大兴趣，该缔约国的沉默或行为，为解释该条约目的将不可避免地被考虑在内。不过，沉默在不构成对一项解释性声明默认的情况下，不能在声明可能产生的法律效力中起到什么作用。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忽视缔约国在澄清或说明一项条约或其中某些条款的含义方面所拥有的选择。

20. 最后，关于解释性声明对于明确认可或反对该声明的国家的后果问题，一般性提及条约的解释惯例即可。总体而言，对解释性声明的反应不能在正式或实质性规则中加以束缚。除非一个或多个缔约国将解释性声明重新定性为保留（这样做将使辩论转向保留的效力问题），否则根据缔约方的意图及其对条约的解释在条约有效期内发挥的重要作用，关于解释性声明及其引起的反应的制度具有一定内在灵活性。

21. 法国代表团对委员会近期在条约随时间演变，特别是嗣后协定和嗣后实践问题上的工作十分感兴趣。具体规定条约解释惯例的特点尤其有用，这些惯例已在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甲）和（乙）项中加以编纂。必须准确识别可能改变书面国际法的程序，特别是除缔约方之间的协议或实践以外，在演进式解释条约时有时会加以考虑的因素。

22. **Tavares 先生**（葡萄牙）说，关于新的专题，葡萄牙代表团仍然对“最惠国条款”是否是一个合适的选择表示怀疑，但是欢迎列入“条约随时间演变”专题。其他专题，如绝对法，对于巩固国际法也极为重要。

23. 他欢迎为使委员会的报告更方便用户所作的努力，并赞赏近期重新开展关于委员会工作的辩论的举措，如作为委员会 60 周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在日内瓦举行的会议以及在大会届会期间举行的法律顾问互动式对话和非正式会议。不过应当采取进一步措施，加强委员会与各国政府之间的互动。例如，应当向委员会成员，特别是特别报告员，提供各国政府在第六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并且更便利各方查阅委员会的文件。对委员会网站的进一步改进也将是一个令人欢迎的步骤。为实现所有这些目的，委员会必须与秘书处开展积极合作。

24. 谈到共有自然资源这一专题，他说，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平衡兼顾，符合现代国际法。该条款草案的最终形式应当是一项国际框架公约。葡萄牙代表团因此欢迎委员会关于大会日后审议能否拟订一项公约的建议。不过，委员会需要决定“日后”所指为何，同时铭记必须稳定有关跨界含水层的法规。

25. 最后，由于地下水与石油和天然气之间在法律和地质上的明显相似性，以及石油和天然气问题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相关性，葡萄牙代表团鼓励委员会关注该专题。

26. 关于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问题，葡萄牙代表团欣慰地看到其大多数过去关切的问题已经在条款草案中得到了反映。他尤其欢迎以下几点：“意图”不

再是确定条约是否可能终止或中止的决定性标准；国际组织被排除在条款草案范围以外；在武装冲突中不会终止或中止的条约类别清单是非穷尽式的；第8至12条草案所采取的方式。然而，还有一些核心问题需要加以解决。该专题的范围不应当扩大到涉及国内武装冲突的情形或只有条约一方参与武装冲突的情形，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有关条文已对这两种情形作了充分规定。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仅有一国预见到遵守条约的困难，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消除遵守条约的困难或不可能性。在条约双方发生持续冲突的情况下，相关问题是正常遵守条约所需要的信任度。

27. 葡萄牙代表团赞成一种观点，即为了确定一项行为的合法性，不应当将侵略国与行使自卫权的国家同等对待。不过，该专题应当限制在条约法的框架内，不应当涉及与使用武力的法律有关的问题。在这方面，他对试图将条款草案与第15条草案作出的侵略定义相联系的做法感到关切。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缔约国大会侵略罪问题特别工作组正在拟定“侵略罪”的定义，必须避免为不同的目的拟定多个定义。因此宜采取谨慎办法。

28. 葡萄牙代表团将在适当时候提交对条款草案的详细评论。

29. **Lijnzaad 女士** (荷兰) 赞扬委员会完成了跨界含水层法条款草案。有关利用共有自然资源的国际法规对于荷兰至关重要，因为荷兰与其他国家共享许多这类资源。她鼓励委员会继续就这一专题开展工作。

30. 不过她感到遗憾的是，荷兰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大多数意见和评论都没有被采纳。尤其是，荷兰就下列问题提出了意见：在经过适当努力但仍造成严重损害的情况下讨论赔偿问题的义务；在协商期间，应请求停止实施或不允许实施计划活动的义务；向面临紧急状况的国家提供科学、技术、后勤和其他合作的义务。尽管其意见被忽视，但是荷兰代表团仍然支持对条款草案的审议采取两步走的办法，并随时愿意参与在大会本届会议期间就该专题通过一项决议的谈判。

31. 在大会上届会议期间，荷兰代表团承认武装冲突对条约的影响这一专题的理论重要性，不过，荷兰代表团仍然认为没有必要审议这一专题，因为近期发生的武装冲突显然没有在条约法方面带来什么严重问题。荷兰代表团不仅质疑条款草案的实际相关性，而且认为有必要重新考虑有关条款是否确实有助于促进国际法主体间法律关系的保障和稳定。

32. 她对拟议的新专题“条约随时间演变”的范围感到关切。本五年期将难以完成这一雄心勃勃的宏大计划。她敦促委员会重新考虑这一项目的范围，争取实现务实的结果。如果需要重新审议现行条约法，该项目也是不可取的。除条约缔结时有效期有限的情形以外，条约缔约方的意图应是条约无限期有效。此外，有一项谅解是，即使情况发生变化，解释有新发展，或出现嗣后实践，条约也应继续有效和必须继续存在。

33. 嗣后实践或嗣后协定的概念在大部分案文中似乎差不多被用作同义语。不过，有必要在嗣后实践与嗣后协定之间加以区分，前者是指该做法往往不能随手可用，没有以组织有序和有意识的方式形成，而后者是指已作出决定，要有意识地发展有关法律。这两个概念需要分别加以研究。

34. 她呼吁在处理“最惠国条款”时应慎重从事，这一专题需要更广泛的分析。对这项条款的理解不仅是一个国际法问题，而且是更专业的国际经济法问题。还有，由于大多数相关判例法都是保密的，拟议的研究所能获取的材料可能有限。

35. **Ehrenkrona 先生** (瑞典) 代表北欧国家就对条约的保留专题发言，他说北欧国家支持在审议保留问题时彻底审议解释性声明以及对其的反应这一普遍意见。解释性声明的使用非常广泛，但是由于与保留相似，它们在太多的情况中常常造成不少困难。如果不阐明如何使用解释性声明，关于保留的实践指南就不完整。

36. 然而，处理该专题应谨慎从事。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现有规则必须得到充分实施。根据该公约第二条，保留是一国的单方面声明，不论措辞或名称如何，其目的在于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的法律效力；关键词是“不论措辞或名称如何”。解释性声明实际上是一种“变相保留”，必须作为保留对待，而非一个新类别。“重新定性”一词为曲解它们提供了理由，并可能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在某个方面，“变相保留”在被“重新定性”之前，可能已经成为或事实上成为一种解释性声明。真正的意图应是，“解释”解释性声明并决定其目的是否在于摒除或更改条约中若干规定的法律效力。一旦得出结论认为作出了“真正”的解释性声明，各国就有机会作出反应，但是行动与否不是强制性的。另一方面，如果解释性声明构成保留，各国就有义务表明他们是否要表示反对。如果保留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背道而驰，即使没有国家反对，保留也没有法律效力。

37. 将无效保留从有关国家间条约关系中分离出来的做法完全符合《维也纳公约》第十九条的规定。这种分离的选择保护了双边条约关系，并开创了在条约体制内对话的可能性。

38. 关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北欧国家同意准则草案 2.1.1 所载意见，即它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与保留相似，因此往往得视为保留。然而，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不同在于，只有声明中的解释可以接受时，它们才能被视为解释性声明。

39. 就“真正”的解释性声明而言，准则草案 2.9.8 是为谨慎起见而列入的，因为它指出了赞同或反对解释性声明不可推定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真正的解释性声明除了解释条约的规则所能赋予它们的意义外，不能再被赋予任何其他意义。正如准则草案 2.9.9 第一段所述，一国仅对另一国对条约提出的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不算赞同解释性声明。还有，试图另外建立一个默认在解释性声明中可以发挥特定作用的制度是徒劳无益的。根据 1969 年《维也纳

公约》第三十一条第三款(甲)项，对解释性声明的认可构成嗣后关于解释的协定，有如何订立协定的一般规则就足够了。

40. 简言之，保留与解释性声明之间的差别主要在于赋予沉默的含意。对保留的沉默构成对保留的接受，但惟一的例外是与条约的目的和宗旨相抵触的保留；而对解释性声明的沉默除了解释条约的现有规则所载列的法律效力外，决不可能引起任何其他法律效力。

41. Defensor-Santiago 女士(菲律宾)说，关于对条约的保留的实践指南，她重点评论说明理由的准则 2.1.9(A/63/10, 第 124 段)。该准则可解释为如果一个条约缔约方选择保留，它必须经受说明理由的“痛苦”。然而，该国或该国际组织可能会竭尽所能避免这种“痛苦”并选择不受准则的这种鼓励。因此，国际法委员会关于该准则没有造成提出保留的困难这一评注就非常不现实了。

42. 1969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第二条第一款(丁)项将保留定义为单方面措辞或冠名以及反映保留方的意图。这就有了很大自由度，等于说通过保留确定缔约方法律关系是一项主权行动。然而，如果条约缔约方根据准则规定(准则草案 2.1.9)提出保留，人们就可以问是否达到了规定的条件，因为根据该条准则，必须说明作出保留的理由。

43. 谈及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特别报告员报告(A/CN.4/597)有关反措施的第三章，她建议国际法委员会应尽量将反措施的性质和范围视为应由国际组织组成文书规范的问题，并且关于该专题的条款草案应用作备用规则。这一机制将确保国际组织的独立性和独有特性得到尊重。在反措施最初的形成阶段，各国还有机会决定反措施与国际组织由成员决定的性质是否相一致等事项。

44. 关于不受反措施影响的义务的条款草案，其重要意义在于须具体确定一般国际法中的哪些规范属于强制性规范(即强行法)。强行法这一概念的含义比

1969年《维也纳公约》第五十三和六十四条的含义宽泛，后者将强制性规范的功能局限于，条约如果与这种规范相抵触将产生无效并终止的结果。

45. 国际法委员会解释第46条草案的评注(A/63/10, 第165段)看来并不包括一国际组织所违背的义务系对“整个国际社会”所承担义务的情况，换言之，不包括对所有国家的义务。该条款草案通过引入“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或国际组织这一类别，提供了一种取得诉讼资格的办法。由于对所有国家的义务等这类义务的性质，受到特别影响(损害)的国家所提起的诉讼可能多种多样，应引起注意。菲律宾代表团想知道在根据条款草案第46条(b)项(一)目援引一国际组织的责任时，如何处理未受到特别影响的国家或组织的利益。

46. **Popkov 先生**(白俄罗斯)说，白俄罗斯代表团期望国际法委员会迅速完成有关《实践指南》草案的工作，该指南对各国适当利用保留和解释性声明很有用处。特别报告员和国际法委员会确实都希望产生一个平衡的文件，将保留与解释性声明条文的各种编撰办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作为逐步发展国际条约法的一种手段。几年来，根据各国代表团的评论意见对该指南草案进行了广泛修订，这证明了国际法委员会与本委员会之间的密切工作关系。

47. 白俄罗斯代表团基本上支持各国在利用对条约的保留时须经过深思熟虑并有所节制。然而，如果使用过度，保留就可能破坏国际条约关系的完整与稳定。因此，白俄罗斯代表团十分谨慎，唯恐对《维也纳条约法公约》基本条款直接或间接地广泛使用保留和修正创下先例。不应将《实践指南》视为怂恿个别国家为本国利益利用保留，而损害重大国际协定的文件。

48. 对于所谓过时提出的保留、保存人对于不符合条约目的和宗旨的保留作出反应的程序以及其他新做法，白俄罗斯代表团在大会前几届会议上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见。除了在这些专题上没有任何创新之外，对于《实践指南》中有关这些专题的条款是否与《维

也纳公约》相符，白俄罗斯代表团也持怀疑态度。不过，它们可以促进新的国际习惯法的发展，并防止国际条约关系中出现人们不希望看到的趋势。

49. 《实践指南》草案应确立解释性声明与《维也纳公约》第三十一和三十二条之间的联系，从而阐明单方面解释性声明这一做法的法律基础。解释性声明可以被视为就特定条款的解释达成一致的一种基本手段。《实践指南》应明确区分保留与解释性声明。因此，白俄罗斯代表团对于设立“简单”和“有条件”两类解释性声明的提议十分疑惑。从法律角度看，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几乎在所有方面肯定就是保留。使用“有条件”一词表明，一个国家是否同意接受特定条约的约束取决于其他国家必须接受的一个保留。解释性声明更应被视为消除条约中不明确或模糊之处或使其与国内立法相一致的一种实用方法。

50. 白俄罗斯代表团赞同保留机制也应适用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看法。在《实践指南》中正式同意使用有条件解释性声明可能会鼓励各方使用以有条件声明提出的“变相”保留。这样一种做法可能引起争议，并对多边条约(不允许对其有保留)和双边条约(并非所有国家都承认保留是可以接受的)的完整性产生负面影响。

51. 关于认可一项解释性声明的方法，白俄罗斯代表认为，仅全盘采用《维也纳公约》规定的程序是不对的。只是沉默而没有按照《公约》第四十五条采取相应行动，不足以作为确定一国是否希望认可某项解释性声明的依据。国际法委员会应拟订表明认可的具体标准，其中也许应同时显现三个特征：沉默、行为和合理长的时间间隔。

52. 应根据不容反悔的原则审议解释性声明的后果问题，该原则有助于在国际法律关系中建立诚信与责任感。作出解释性声明的国家以后未经认可其解释性声明的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同意，应不能放弃或更改其声明。同意一解释性声明的国家或国际组织应不能由于它们与解释性声明的提出国后来达成协议，而使有关声明失效。

53. 对一解释性声明作出说明理由的反对应着重于解释性声明所涉及条款的生效和执行，而非声明本身。从性质上讲，解释性声明没有法律效力，因此，将反对一项声明的后果等同于反对一项保留的后果是没有道理的。不应将可能纯粹出于政治考虑作出的没有说明理由的反对视为引起法律后果的行为。白俄罗斯代表团希望国际法委员会与会员国密切合作，完成对条约的保留的工作，同时充分考虑到国际实践及其受《实践指南》影响的方式。

54. 关于国际组织的责任专题，他认为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国际责任概念的发展和国际组织活动国际法律基础的加强。关于国家责任的许多国际法则也适用于国际组织的责任。然而，由于国际组织的特定法律性质，其责任也有一些特有的特征。总体而言，国际法委员会拟订的条款草案考虑到了这些特征，这一点令人满意。不过，其中依然存在一些缺陷，在前几届会议上，包括他本国在内的一些代表团对其提出了批评。他希望特别报告员在其第七次报告中适当注意这些批评意见，并对有关责任的基础、解除行为责任的情况、一国际组织对一国或另一国际组织行为的责任等问题的条款草案提出修正案。

55. 国际组织可以为不法行为承担责任，也可以就国家或其他国际组织对其造成的损害提出索偿。在拟订履行责任的条款草案中应充分考虑到国际组织责任的这两个方面。

56. 遗憾的是，条款草案没有涉及一受害国际组织对实施不法行为的国家诉诸反措施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简单明了，因为它需要区分一国际组织就对其造成的直接损害采取的反措施与该国际组织在其管辖范围内实施的制裁。然而，没有相关条款草案给国际责任法留下一项空白，并可能被解释为限制拥有国际法人资格的国际组织就对其造成的损害提出索偿的权利。

57. 白俄罗斯代表团赞同以下意见，即一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在反措施上的关系应有别于一国际组织与非成员受害国之间的关系。然而，条款草案规定只有在

与相关组织的规则不一致的情况下方能诉诸反措施，这一做法一方面严重限制了会员国对一国际组织不遵守其章程或其他国际法律文书规定的义务作出反应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大为限制了就所造成的损害取得适当赔偿的可能性。

58. 应就会员国对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的相称性设立更严格的要求。会员国诉诸反措施不应妨碍国际组织为其会员国的社会、人道主义及其他普遍利益履行职能，而这些利益与该组织的不法行为无关。应禁止会员国采取可能破坏或终止该组织活动的反措施。

59. 关于反措施的目的和限制的条款草案应明确规定诉诸反措施的程序，因为实践中可能出现一种情况，即反措施不仅损害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且还会影响到该组织会员国的利益。此外，力促该国际组织实施国际不法行为的国家与积极反对实施这种行为的国家都将得不到国际合作的惠益。国际法委员会应更为详细地审议如何保护未支持实施国际不法行为国家的权利。

60. 国际法委员会应重新评估在违背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国际义务的情况下承认一国际组织援引责任权利的一切后果。能否就违背这种义务的行为援引责任的国际法律规范仍然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主要与国家责任的履行相关联。就违背对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的行为援引责任的权利不能赋予所有国际组织，只能赋予接近实现普遍参加并在全球开展活动，因而能够宣称保护整个国际社会利益的那些国际组织。没有理由将这样一种权利赋予区域组织，因为它们的职能远没有超出解决区域问题和保护本组织会员国的直接利益这个范畴。

61. **You Ki-Jun 先生** (大韩民国) 谈到对条约的保留时说，大韩民国代表团支持国际法委员会不偏离 1969 年、1978 年和 1986 年《维也纳公约》有关条款的共识，并希望强调《实践指南》应避免过多引入在缔结这些公约时所没有的新条款。

62. 国际法委员会应重新评价其 2001 年的决定，并考虑是否将关于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准则保持不动，而不是用同化这种声明与保留的单一准则取代它们。准则草案 2.1.9 规定，保留应当尽可能说明作出保留的理由；然而，1969 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十九条并未要求说明理由。准则草案 2.6.5 规定有权成为条约缔约方的任何国家或任何国际组织可以提出反对，而 1969 年《维也纳公约》第二十条只提及“另一缔约国”。准则草案 2.9.3 界定了“重新定性”，据特别报告员称，这只是对解释性声明的四种反应之一；然而，大韩民国代表团认为将公约没有的术语引入《实践指南》并非明智之举，因为国际法委员会实际上可能在重新编写《维也纳公约》制度。

63. 保留不论好坏，都是保证众多国家参与条约制度所必要的，对它们加以过多限制只能适得其反。应设法兼顾各国普遍参加多边条约与维护条约制度的统一这两个方面。

64. 顺利完成有关国际组织责任的专题工作，就会令人回想起国际法委员会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方面取得的成就。国际组织的责任和国家责任是对国际不法行为的国际责任专题的两个支柱，大韩民国代表团认为，这种责任应根据一个基本统一的制度来确定，并应同国家间条约与国家与国际组织间条约或各国际组织间条约之间的关系相称。虽然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存在某些内在差异，但是将国际组织的反措施仅限于“暂停履行涉及该组织的条约关系之下的约定义务”是一回事，而完全不让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则是另一回事。

65. 关于驱逐外侨问题，大韩民国代表团强调，绝对禁止一国驱逐本国国民是一条公认的国际法律原则，得到许多国际人权文书的支持；因此，它认为国际法委员会应侧重于驱逐外侨问题，而非国籍或剥夺国籍问题。

66. **段洁龙先生**（中国）谈到对条约的保留专题时说，关于准则草案 2.6.5（反对者）规定对一项保留的反对可由两类主体提出，第一类为缔约国或缔约国际组

织，第二类为有权成为条约缔约方的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团对第一类主体不持异议，但对规定第二类主体有权在成为缔约方之前提出反对持怀疑态度，因为在该国或该国际组织表示同意接受条约约束前，这样的声明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准则草案不一定必须对不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做出规定。另外，承认一国或国际组织在成为条约的缔约国或国际组织前，有权对缔约国的保留提出反对，还会产生该国或国际组织是否有义务按照条约规定，将此种反对通知条约保存机关，条约保存机关是否有义务向缔约方通报反对意见等法律问题。

67. 对于有关解释性声明的案文，中国代表团总体上满意，但认为准则草案 2.9.9 第 2 段的内容存在不足。首先，其与准则草案 2.9.8 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澄清。准则草案 2.9.8 规定赞同或反对解释性声明不可推定，但 2.9.9 明显具有推定解释性声明的效果。其次，将沉默推定为默认有无国家实践基础？如果确有实践基础，哪些特定情况下可酌情作出推定，推定需要考察哪些因素等，都需要进一步予以明确。

68. 国际法委员会暂时通过的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 8 条草案，仍基本沿用了类推和比照国家责任条款相关内容的方法，辅以欧盟等少数国际组织的看法或实践为佐证。采用类推的方法有其优点，因为一般而言，就两个相似的问题，适用于其中之一某些规则在做必要变通后，可以适用于规范另一个问题。国家责任与国际组织的责任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只有在相似的情况下，类推才能适用于国际组织的责任。而那些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中原本就存在争议的、尚缺乏国际实践佐证的规则，则不适宜类推和比照适用于国际组织的责任。此外，国家及其他国际法主体的责任问题与国际法的执行相关，可能涉及对国际法主体权利的限制。因此，国际法委员会在类推和比照适用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时应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

69. 关于有数个责任国或国际组织的情况下如何援引责任的问题，第 51 条第 2 款就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援引责任限定了先后顺序，区分了负有责任的国

际组织的“主要责任”和该组织成员国的“次要责任”。中国代表团认为，作为一般性规定，这种顺序上的限制是不适当的。至少，在第 25 条至第 28 条所规定的各种情况下，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理应有权决定援引责任国或责任国际组织责任的先后次序。

70. 第 52 条涉及受害国或受害国际组织以外的国家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的问题。中国代表团认为，该条与反措施问题具有相关性。如果第三国或国际组织有权援引责任，接下来就会涉及它们是否有权采取反措施的问题。因此，该条需要与委员会已经讨论但尚未通过的条款草案的反措施部分一并考虑。我们认为，对第三国或国际组织援引国际组织的责任在实践上远未确立，理论上颇多争议，即使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相关内容也有高度的争议。

71. 关于国际组织是否有权采取反措施或成为反措施的对象以及条款草案是否应包含反措施的问题，中国代表团认为，在国际组织的责任中规定反措施是有问题的。国际组织不同于国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它是对以国家为独立主体的分散国际社会的某种程度的组织和凝聚。而反措施更多地是与非组织化的、分散形式的国际社会相伴的，将反措施概念引入国际组织的责任制度，与国际组织承担的对国际社会组织化的职能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国际法委员会应对引入反措施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

72. Ruiz Cerutti 女士(阿根廷)说，委员会第六十届会议期间关于解释性声明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而这个专题是 1969 年、1978 年和 1986 年的《维也纳公约》没有涉及的，这对禁止提出保留意见的条约特别重要。由于法律文献中缺少解释性声明的内容并且这方面的实践也很少，它们可能导致人们从保留的法律机制中寻求解决办法，尽管如此，阿根廷普遍赞同拟议准则草案的内容，也赞成不把适用于保留的条款转入解释性声明的选定方式。

73. 具体来说，阿根廷赞同准则草案 2.9.2 中反对解释性声明的定义的拟议文本，其中提出一个国家不必把自己局限于仅拒绝接受解释性声明提出的解释，而

是可以提出另一项解释。阿根廷还认为，准则草案 2.9.3 包含了反对解释性声明的一个基本方面，即允许国家能够在解释性声明因其预期法律效力被视为“变相保留”时，对其他国家提出的解释性声明重新定性。如果条约没有明确允许或禁止提出保护人员等保留，审查这些条约的解释性准则时，必须考虑到所述准则草案；在这方面，准则草案第二段非常重要，它规定提出重新定性时，国家和国际组织应当考虑到准则草案 1.3 至 1.3.3。阿根廷代表团还认为准则草案 2.9.4 的措辞适当地反映了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对解释性声明作出反应的能力，甚至在声明人对条约解释性声明的认可、反对或重新定性生效之前的反应能力。

74. 阿根廷代表团认为，准则草案 2.9.8 采用的不可推定赞同或反对解释性声明的方式特别相关，因为它反映了一种可以把解释性声明与保留区别开来的具体特征，其中国家不必一定要对解释性声明作出反应。准则草案 2.9.9 第 1 段中也正确地反映了同样的立场。不过，阿根廷代表团赞同特别报告员的意见，即虽然也许有必要寻找一种理解“某些具体情况”的更准确的定义，以避免适用准则草案时的误解，但是如准则草案第 2 段所述，这项原则应加以灵活考虑。关于对有条件解释性声明作出反应的准则草案 2.9.10，她赞成措辞暂定，因为从法律性质来看确定那种声明是解释性声明还是保留为时过早。尽管如此，还应回顾一下，所说的区别不论怎么称呼，都应该以其目的是否是修改条约条款的法律效力为根据。

75. 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专题，她赞赏特别报告员第六次报告(A/CN.4/597)沿用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的一般格局。大多数国际文献都承认关于国家责任的准则能够适用于国际组织，条件是作出必要的修改。在这方面，她提请注意 1996 年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经费筹措的行政和预算问题的报告(A/51/389)。还有，条款草案的普遍性和灵活性意味着它们能够适用于一大批国际组织。

76. 阿根廷代表团支持关于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通知其要求和可否提出要求的条款规定，它们大体上重复了关于国家责任的相应条款。特别是，她赞成尊重关于索偿国籍的任何适用规则，如果需要用尽当地补救方法的规则适用于索偿，则要用尽索偿针对的组织提供的所有有效和现有补救措施。后一项条款灵活的措辞使它能够适应不同种类的组织。

77. 关于援引责任权利的丧失，阿根廷代表团认为，虽然国家责任条款草案有关规定在有权放弃索偿的国际组织机构方面适用于国际组织的责任，但是国际组织本身的规则应加以考虑。

78. 阿根廷代表团赞成提出的第 50 条和第 51 条草案，它们与关于国家责任的相应条款相一致。关于第 51 条草案，必须考虑到一项基本原则，即一个组织拥有与其成员不同的和单独的法人资格并且国家成员并行或附属的责任尤其取决于该组织的具体特征和规则。阿根廷代表团总体上支持关于一实体而不是一受害国或国际组织援引责任的第 52 条草案。然而，只有在被赋予保护国际社会利益的职能时，非受害国际组织才能对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违反义务行为提出索偿。还有，该组织应当拥有一个世界性行业或一批有代表性的成员国，才能把对影响整个国际社会的违反义务行为的索偿合法化。

79. 委员会反措施讨论的主要重点在于可否授权受害国或国际组织对违反国际义务负有责任的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这是一个要极其谨慎处理的问题。阿根廷代表团赞扬工作组的努力，工作组已得出结论，条款草案应当适当管制采用这类反措施的条件和限制，同时考虑到国际组织的具体情况。

80. **Witschel 先生** (德国) 说，关于报告第 26 段提到的问题，报告所称的“简单”解释性声明不应当按照《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 2 条的定义被视为保留。然而，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难以了解一国对解释性声明保持沉默的含义；可以推定这是缺乏国家实践的原因。不论怎样，沉默都不能视为一种答复，使声

明对有关国家产生约束力；国家没有义务对解释性声明作出反应，而这些声明也不能限制他方的权利。不过，如果根据一般国家实践预计有关国家或国际组织会对给定的解释提出抗议，沉默就具有法律效力。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提出抗议的一方将被视为它表示赞同。国际法院对北大西洋沿海渔业案的判决与这方面问题尤其相关。关于第 26(c) 段中的问题，沉默不能被视为一项声明具有的法律效力的一部分；而是对这种声明的一种反应，从而构成任何法律效力的先决条件。

81. 关于解释性声明对声明方的后果问题(第 27(a) 段)，他认为声明方只有在另一方信赖声明，如表示认可时才承担义务。如果没有明示认可，不容反悔的原则可能发挥作用。关于已经认可声明的一国或一国际组织的后果(第 27(b) 段)，他认为声明中作出的解释对已经认可声明的一国或一国际组织和声明方之间具有法律约束力。这种情况与《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第 3(a) 款的情况相类似。

82. 关于解释性声明对表示反对该声明的一国或一组织的后果问题，如准则草案 2.9.2 所述，这种反对意见可能限制或排除声明预定的法律后果。然而，一方和声明方之间没有解决的争端并不能造成有关条款或整个条约对双方都不适用。

83. 德国对前几个问题的答复多少涉及第 28 段的问题。不过，值得补充的是，如果要适用与《维也纳公约》第 31 条第 3(a) 款类似的情况，需要各方对解释性声明表示赞同。解释条约时，如果允许他方作出反应，必须考虑到这种商定情况。

84. 委员会关于国际组织国际责任的工作毫无疑问受益于它的国家责任的工作。尽管他赞同欧洲联盟的发言，特别是其中认为条款草案令人满意的结论，但是他还要对若干问题作出评论。首先，关于国际组织援引责任的问题，德国代表团认为，虽然设想国际组织仅在有限的情况下会违反国际法，但是象第 52 条草案提出的那种规则是关于一般责任的法律进行总

体协调的必要条件。然而，不论国际组织的职能如何，不必要把它适用于所有国际组织。国际组织与国家不同，不具有国际法人资格，仅在其任务方面具有职能能力。因此，他赞扬委员会的决定，规定只有在有关国际组织的职能包括维护国际社会利益的情况下，国际组织才有援引责任的权利。

85. 除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外，国际组织采用反措施应对国际组织的国际不法行为，似乎还没有成为经常甚至既定的实践。然而，应当有采取反措施的选择，不然就会削弱国际组织执行任务的能力。同时，鉴于国际组织数量大和种类多，应限制使用反措施。应当制定明确的规则，说明何时和在何种条件之下国际组织可采用反措施或者可对国际组织采取反措施。

86. 国际组织根据其内部规则采取的措施并不构成反措施；相反，它们是受一套具体规则管制的制裁形式，如安全理事会采取的制裁。另一方面，还有大量实践，其中大部分与欧洲联盟有关，涉及在违反国际法对所有国家的义务之后，国际组织对非成员国采取反措施的问题。这不论怎样都表明国际组织处理与成员国的关系和处理与非成员国间的关系应当有所不同，但是更好的办法还是不允许国际组织对国家采取反措施。特别报告员正确地选择了把反措施的特别规则列入条款草案，而没有采用简单的“无妨碍”条款。不然，如第 55 条草案目前的措辞所示，就没有机会表明作为一般规则对国际组织与其成员间的关系不能采取反措施。

87. **von Wirén 女士** (爱沙尼亚) 提到对条约的保留时说，爱沙尼亚代表团赞赏委员会关于《实践指南》的工作，特别是准则 2.3 (过时提出的保留)、2.4 (解释性声明的程序) 和 3.1 (条约允许的保留)，由于现有法律文献相互矛盾，欢迎作出更明确的澄清。《实践指南》草案是《维也纳公约》没有管制或管制不足的一些方面的宝贵依据。然而，爱沙尼亚代表团对过时提出保留仍有一些法律关切问题。它认为《维也纳公约》不允许作出这样的保留，其中规定只有在签署、批准、

接受、认可或加入一项条约时才能提出保留。不过，爱沙尼亚代表团高兴地看到委员会的报告保留了反对过时提出保留的可能途径，结果是保留将没有法律效力。

88. 委员会最近关于保留的工作将澄清《维也纳公约》没有涉及的解释性声明的规则问题。报告还提出国家实践中经常使用的重新定性专题，非常希望提供这项专题的准则。不过，爱沙尼亚代表团并不完全赞同准则草案 2.9.4 提出的建议，即提出重新定性应不设时间限制。在实践中，就象反对保留的情况那样，爱沙尼亚往往使用 12 个月的期限。还有，爱沙尼亚怀疑能否证明为修改条约法律效力提出有限制的声明 (所谓“有条件解释性声明”) 可作为解释性声明的亚类。解释性声明与保留很相像，因此，倒不如说它们可能符合保留的亚类的条件，它们的目的是澄清条约一些条款的含义，而对条约关系不产生法律效力，而有条件解释性声明的目的是修改条约的法律效力。

89. 最后，爱沙尼亚代表团认为，对会员国来说，反对的法律效力是对条约保留这个专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维也纳公约》提出的规则需要在《实践指南》中加以发展，使各国的反对意见更容易达到理想的效果。爱沙尼亚代表团认为，国家在提出反对意见时希望达到的法律效力常常不同于《维也纳公约》所述的法律效力。国家实践证明了这种意见，因为反对意见常常包括“公约因而在两国之间实施，但[国家]并不得益于保留”这样的表述。甚至可以提出修改《维也纳公约》所述规则的习惯法新规则并且委员会考虑到这方面问题也是合乎事宜的。

90. **Dufek 先生** (捷克共和国) 赞扬关于国际组织国际责任的第 46 条到第 51 条草案，它们基本上反映了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的相应条款。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实践证明这样的观点，即一个国际组织有权采取与国家同样的方式援引国际责任。

91. 然而，关于对应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第 48 条的第 52 条草案，国家实践并不是非常明确，法律文献似乎也众说纷纭。报告提出的唯一重要实例涉及欧洲

联盟，而欧洲联盟只是一个相当例外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因此，委员会应当着重在已经有广泛的国家实践、先例和学说的领域编纂国际法。第 52 条草案本身并没有完全反映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主要差别，即国际组织仅仅拥有职能和专门的法人资格。按同样道理，违反国际义务应被视为一种越权行为，在这个意义上它完全超出该组织的能力范围。捷克共和国代表团在特别报告员提交第七份报告之前保留对此事的立场，该报告应当澄清对一国际组织行为国家责任的若干不确定事项。

92. 鉴于国家实践有限，在考虑反措施时需要极其谨慎，特别是第 52[51]条草案中反映了该专题。尽管一个国际组织可以在某些情况下采用反措施，但是这些措施都是国家间关系固有的分权执法的要素。采用反措施，一国际组织仅能允许暂时不履行条约的合同义务。关于所谓的纵向关系——安全理事会或区域组织实施的制裁，它们涉及的法律体制基本上依赖于该组织的规则并且可能不同于国家责任条款下反措施的一般体制。单独考虑国际组织与其成员和与其非成员的关系也是可取的。

93. 关于驱逐外侨的专题，他表示多重国籍已变得越来越普遍。因此，他赞扬委员会决定重点研究驱逐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的人的问题。根据国家实践，特别报告员在第四次报告(A/CN.4/594)中得出结论，在驱逐不会造成无国籍的情况下，不驱逐国民的原则并不适用于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的人。捷克共和国代表团并不赞成这个观点。根据捷克的立法，拥有捷克国籍和外国国籍的人被视为捷克国民，因此，绝对禁止驱逐他或她。还有，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的个人受到任何国籍国的保护免受驱逐。可以说，任何国际条约中都没有明示禁止驱逐这些人，但是根据若干人权文书这种驱逐肯定是不能允许的。因此，条款草案应当强调禁止驱逐是绝对条件，没有例外。同样，特别报告员在报告中说，一个人的主要或有效国籍是确定驱逐是否合法的重要条件。不过，捷克共和国提倡绝对禁止驱逐国民，它也认为没有必要在驱逐时确定一个人

的主要或有效国籍。捷克立法也不允许在准备驱逐时剥夺具有双重或多重国籍的个人的国籍，因为那将侵犯他们的人权。这种措施不是保护国家和国家利益，而是用于对某些群体的剥夺或歧视等不合法的目的。区域和世界人权文书都禁止任意剥夺国籍的行为。

94. **Astral di 先生**(意大利)说，并非所有条约保留问题都完全值得委员会花时间讨论。这尤其适用于解释性声明，虽然解释性声明产生一些有趣的问题，但是它们不能被视为保留，因而完全可以从目前对这个专题的研究中省略。

95. 《实践指南》中大多数准则草案都可以接受。然而，准则草案 2.6.13 过于死板：提出反对的 12 个月期限似乎可以推定，如果 12 个月内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就接受保留。正如委员会对准则草案 2.6.15 的评注所述，反对常常在 12 个月期限到期后才提出。准则草案 2.6.13 和 2.6.15 应当反映这种现实情况，而不是在 12 个月期限到期后让不可接受的保留生效。

96. 关于国际组织责任的条款草案一般可以接受，但要增加关于受理索偿的第 48 条草案。要国际组织采用与国家责任条款草案不同的方式似乎没有多少理由。委员会应当考虑这种意见，以便填补关于解除行为不法性情况的第 19 条草案的空白。

97. 关于反措施的条款草案，他说，在针对违反对整个国际社会承担的义务采取措施时，应当区分国际组织和国家。意大利代表团赞成报告第 140 段提出的意见，即这样的组织只有被赋予保护该义务所基于的普遍利益的职责时，才有权采取措施。

98. 意大利代表团赞成这样的意见，即对驱逐外侨的研究并不是讨论国籍法的适当途径。他支持委员会的意见，即国家不能合法地驱逐国民，即使他或她还拥有第二个国籍，国家也不能为驱逐个人的目的剥夺他或她的国籍，从而规避禁止驱逐国民的规定。这是条款草案应当规定的重大规则。

下午 6 时散会。